

良渚古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本报记者 陈佩珍 驻浙记者 蒋萍

从 1936 年余杭县良渚镇人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良渚考古经历了不少坎坷：最初它被认为是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晚期黑陶文化，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良渚古城中的反山、瑶山两个遗址被发现，出土的玉器超过了以往良渚玉器发掘的总和，一股研究良渚玉器的热潮迅猛形成。此后，良渚文化不仅成为中国史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还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组成部分里的区域型考古学文化。2007 年，良渚古城被发现，良渚古城在华夏大地古国林立的状态里，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中国考古协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认为，良渚古城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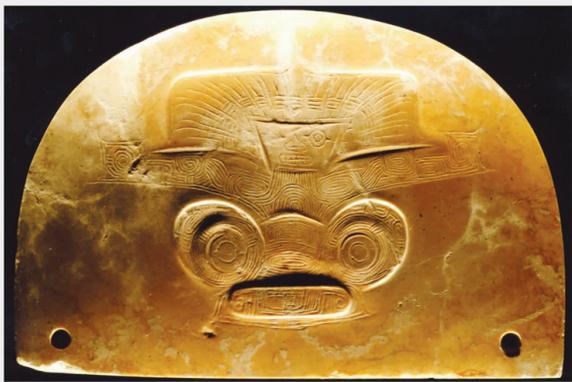
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它与良渚玉器等一同构成良渚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过去一年，良渚古城有两大重要发现：官殿区莫角山遗址东侧的河道中发现了大量玉器、石器、漆木器等高端手工业相关的工具和半成品，考古学家由此推测两岸高地曾经是良渚古城内的作坊区；莫角山遗址的南端发现了足有 20 万斤的碳化稻谷堆积，这说明当时的良渚古城中已经有大规模的粮食仓储。

“至于这些粮食从哪里种植、从哪里运来仍是待解的谜团。目前考古团队已经制定了接下来的规划，将围绕资源与环境、水利与工程、技术与工艺等方面对良渚古城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对记者说。

“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创造出了非凡的物质成就、形象的图像符号、统一的精神信仰、分化的社会阶层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组织，为中华 5000 年文明史提供了最为直接、最为典型的物证，是人类共同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



良渚古城遗址鸟瞰图。(均良渚管委供图)



玉琚



玉琮



玉三叉形器

良渚古城的城市规划领先 1500 年



良渚遗址第一发现人施昕更。

良渚古城遗址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与遗址功能直接关联的自然地形地貌组成，占地总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其中城址面积约 631 万平方米，由官殿区和外城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组成，类似后世中国都城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

去年 11 月，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文物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经过 18 个月的努力，一座 5000 年前的古城遗址得到确认。良渚古城当时就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圣地”。

良渚古城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提供了重要实证。被普遍认可的原因有两个：在世界同期和全国范围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清晰的水利系统。

“近年来我去过很多国家，看了许多水利系统的建筑，对比之下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更加完善。”

“良渚古城里发现的河道基本上是人工开挖或者是经过人工的改建，河的两岸一般用竹编或木杈伏岸。美人地河道的两侧在良渚时期进行了三次以上的木板伏岸，木板的底下还分布着横竖交叉的枕木。这说明在生产生活中，良渚百姓在垃圾淤塞河道后，通过疏理又进行木板疏岸，对水资源的管理经过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蒋卫东解释。

良渚古城作为首都，选址却很特别，它不在良渚遗址的中心位置，而是在良渚遗址偏西南一角。

分化，这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认为，随着不断地考古发掘，良渚古城成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实证理由更加充分，特别是良渚古城庞大的水利系统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

通过对大型水利系统的多方面研究发现，该水利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多方面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

“良渚古城里发现的河道基本上是人工开挖或者是经过人工的改建，河的两岸一般用竹编或木杈伏岸。美人地河道的两侧在良渚时期进行了三次以上的木板伏岸，木板的底下还分布着横竖交叉的枕木。这说明在生产生活中，良渚百姓在垃圾淤塞河道后，通过疏理又进行木板疏岸，对水资源的管理经过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蒋卫东解释。

良渚古城城址区及水利系统均为人工堆筑而成，工程极为浩大。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的土石方总量达 1005 万立方米。去年，通过碳 14 分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的历时性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研究员王宁远告诉记者：“原先我们只知道良渚古城内有什么东西，但是哪个东西先建、哪个东西后建，我们是不知道的。去年的碳 14 分析后，我们大致可以排出一个营建顺序：水利系统——官殿区——王陵区。水利系统建了一两百年后才建设了城墙，先建内城再建了外城。”

这样的城市设计在王宁远看来是很了不起的：“良渚人创造的规模庞大的城市系统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莫角山官殿区堪称中国最早的官城，官殿区的面积要远远超过年代更晚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头官城或官城。官殿区、内城、外城的格局类似后世都城官城、皇城、外城的三重结构体系，这是中国最早的重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以 8 平方公里的外城计算，其占地规模一直领先了 1500 年，直到距今 3500 年前后的郑州商城才被超越。”

良渚古城突然爆发式地兴起。蒋卫东认为，这和良渚古城周围资源的优势分不开。新的考古发掘也印证，天目山里面有玉料的，这个地方玉料的分布和玉作坊的丰富性是这个城市快速兴起很重要的原因。



瑶山玉牌饰

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

良渚古城作为首都，选址却很特别，它不在良渚遗址的中心位置，而是在良渚遗址偏西南一角。

“这里有水源的优势，北苕溪从天目山下来就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安全防卫上，四周都是山，可以抵御外来入侵；交通便利，良渚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设施道路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暴发，冬季则可能断流，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方便运输。”蒋卫东对记者说。

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发展序列清晰，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立的文化区，从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先后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等发展阶段。马家浜、崧泽时期的文化积累为良渚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良渚古城的兴起是一种突发式的兴起，考古发现的崧泽时期的村落还不如马家浜时期多，而良渚经过早期积累后，良渚古城突然爆发式地兴起。蒋卫东认为，这和良渚古城周围资源的优势分不开。新的考古发掘也印证，天目山里面有玉料的，这个地方玉料的分布和玉作坊的丰富性是这个城市快速兴起很重要的原因。

良渚古城作为首都，选址却很特别，它不在良渚遗址的中心位置，而是在良渚遗址偏西南一角。

玉琮是判断良渚文化最明确实物

说到良渚文化的起步和发展过程，不能不提良渚遗址的发现者——施昕更。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公布了 1930 年出土于良渚后湖村的两件玉璧，并专门介绍了出土状况。这份报告不仅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遗址的文化面貌，而且还第一次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了良渚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能够大放异彩的先声，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

在 20 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有两个重要的考古组。一个是 1928 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组，团队成员有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哈佛大学考古学博士梁思永等。受传统史学观的影响，他们的主要精力在黄河流域。另外一个著名的考古组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为首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他们主要在长安、兴平、凤翔、宝鸡等县进行周秦遗址的调查。

发现良渚遗址的施昕更却是一个“职业生”：由于种种机缘，他在 1929 年杭州首届西博会得到了打零工的机会，因为勤快能干，后来他被招进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前身)，在地质矿产组里面做助理员工作。

1936 年 2 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5 月，杭州古荡因建造第一公墓，出土了石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做了一天的试掘。

施昕更是良渚人，他看到古荡地区出土几块石器后，发现跟之前家乡出土的器物很像，出于对文物的敏感，第二天他就回家尝试找遗址，他找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于 1936 年 11 月 3 日才在良渚镇边上找到了几个遗址。“一个职业生在发掘和整理研究的过程中，以严格考古学的流程为范本，对遗址的判断，对器物的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划时代意义就在这里。”蒋卫东说。

良渚遗址从发现至今，不论是良渚古城还是遗址的其他区域，玉器已经是这个地区最为鲜明的出土代表。其中，玉琮甚至成为判断良渚文化最明确的实物。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认为良渚玉琮内圆外方的形状，跟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是共通的，玉琮中间的孔，象征着天地的一种贯通和联系。

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寿田表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浙江省、杭州市和余杭区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建设良渚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努力将良渚遗址打造成“中华文明朝圣地，中国文化新名片”。